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访问延安始末

□袁武振

陈嘉庚是华侨史上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于一身的典范，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是他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页。

执意亲往延安

1937年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广大爱国华侨的精神为之振奋。次年，南洋800万华侨的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1939年冬，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布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引起海外爱国华侨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五十余人抵达重庆。

陈嘉庚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行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一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行程，他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嘉庚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延安之行。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执意亲往延安。由于陈嘉庚的坚持，在共产党驻渝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安排下，经毛泽东主席正式邀请，陈嘉庚的延安之行终得实现。

悉心考察实情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此间，他不顾67岁高龄，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并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书记，拜会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

6月1日下午，陈嘉庚去杨家岭赴毛泽东之约。陈嘉庚对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

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日本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次日午饭时，朱德向他介绍了八路军英勇作战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两党摩擦的情况。此后，毛泽东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4日下午，他们在考察团住处延安交际处一直谈到晚上10点。

陈嘉庚在重庆时，常听说陕北延安等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即被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使他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有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回答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10万、20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答：“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因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广泛宣传红区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勇于接受真理，仅9天的延安之行，“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认识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

陈嘉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离延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42年免去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特务分子不断骚扰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岛隐居姓长达10年之久。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49年，陈嘉庚回到“梦寐神驰”的祖国，并应毛泽东之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纪念碑碑文敬读

□林业茂 郑大壮

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纪念碑，位于贵州省赤水市南郊杉树坝的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内。纪念碑正面刻“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后台阶正上方立附碑一座，上刻“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碑记”，全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在赤水河流域黔、川、滇毗邻地区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

是年，“遵义会议”后，一月十九日，红军挥师北上，拟在泸州、宜宾一带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国民党急调重兵防守长江、实施围堵。红军抵达赤水县境内，于二十七、二十八日先后在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于二十九日在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火速行军，越四川古蔺、叙永，进云南扎西。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迅速迫近；红军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改为东征。二月十八、十九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直插桐梓县、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两师八团，获得长征以来首次大胜。随后，红军移师仁怀，于三月十六、十七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摆出渡江之势，敌军急调各部围堵，红军见敌中计，迅速回师，于二十一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淋滩等地四渡赤水河，疾速南进，强渡乌江，近逼贵阳，诱迫蒋介石在贵阳急电滇军援筑（助）。红军调虎离山成功，迅即挥师入滇，佯攻昆明，实策北上，于五月上旬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四渡赤水”之战，体现了毛泽东等一代伟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用兵如神的宏大战略。

“四渡赤水”之战，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是毛泽东生平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期间，许多红军将士英勇杀敌，捐躯战场，遗志后世，彪炳千秋。为世世代代弘扬四渡赤水精

神，子子孙孙缅怀红军革命先烈，赤水人民敬移325位红军烈士忠骨安葬于风光秀美的赤水河畔杉树坝，敬迁全市26个烈士纪念设施于此，将原建“赤水革命烈士陵园”扩建为“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供后人凭吊瞻仰。爰勒石铭文，以资纪念。

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四渡赤水”精神海育千秋！
 中共赤水市委
 赤水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重立

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第一个为纪念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而修建的陵园，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一）

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仿照南京中山陵样式依山而建，正门立有铁链枪式陵园牌，上刻“赤水红军烈士陵园”八个镀金大字。纪念碑是陵园的主体，高1935米，寓意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碑身呈火炬形结构，用红、白两色花岗石装饰，下部横向标注四渡赤水的具体时间；碑座四周为4幅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四渡赤水的战斗场景。

纪念碑后为陵区，呈扇形排开108座大理石竖碑，庄严肃穆，全部以“红军烈士之墓”为碑名；最顶端为长342米、高95米的巨型长城式屏风，上刻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气势磅礴，雄伟挺拔，蔚为壮观。

（二）

85年前发生在川黔滇交界地区的四渡赤水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被西方评论家赞誉“为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在经历湘江战役后，兵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弹药奇缺、补给匮乏、士气低落。而国民党集结40

万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堵，企图在黔北地区彻底消灭红军主力，中国革命危在旦夕。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之后召开了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四渡赤水战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碑文高度概括了战役发生的时间、地点，红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前后经过，展现了毛泽东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高超指挥艺术。

（三）

四渡赤水战役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克服万难，展现出了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四渡赤水并非预定计划，而是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机应变。土城战斗失利后，毛泽东下令红军主动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一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此后，毛泽东依据敌我态势多次修改行军计划，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走老路，时走新路，寻求歼敌有利战机，最终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回师遵义，一举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娄山关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更是共产党人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

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毛泽东一贯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军所有战略方针都是建立在“打”这个基本点上，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如果没有开始一渡、二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大量调动敌人形成有利战机；如果没有之后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无法迷惑敌人，把敌人拖疲、拖垮，从而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所采用的灵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们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就是让部队迅速前进和后撤，快速集结和分散，声东击西、寻机破敌，坚持把“走”与“打”、消灭敌人和保存实力辩证统一起来，指挥中央红军如同游龙，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集团之间，积极创造战机，以少胜多，化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是在极为险恶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在近4个月的战斗中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但他们凭借着钢铁般意志和超人胆识最终获得胜利。红九军团在第四次渡赤水时为掩护主力红军顺利渡江而错过了过河最佳时机，毅然决定继续留在乌江北岸承担“诱敌”“阻敌”“断后”、掩护主力红军行动的重任。经过艰苦鏖战，兵力由1.1万人到最后只剩2000余人，无数红军将士用意志和力量、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脚步和足音已渐渐远去，但伟大长征精神已成为不朽和永恒。

聂耳：以斗争精神谱写时代最强音

□刘 杰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先驱，为创造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以笔和乐曲为枪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成为不朽的民族战歌。聂耳仅23岁就英年早逝，却以最新的、革命的、斗争的姿态出现，正如洗星海所指出，“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聂耳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因率领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斗争并取得胜利，使那些封建卫道者以“有碍孔子尊严、圣庙不能办学”的目的没有得逞。学校为此颁发书面褒状表扬聂耳的正义行为。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聂耳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宣传和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作文中，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认为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为残酷，提出了“欲免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产）阶级不可”的见解。聂耳虽还是一名中学生，但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已开始深入思考，认识日渐成熟。1926年，聂耳在《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时应提倡科学之原因》的作文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

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走上革命音乐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替人民呐喊、为人民斗争是聂耳始终如一的斗争方向。1932年7月22日，他在上海《电影艺术》第三期刊载的《中国歌舞短论》中有力抨击当时文艺作品的现状，“香烟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几十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明确指出黎锦晖作品中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高呼“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聂耳把维护底层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无限的感动，体现了聂耳鲜明的斗争方向。聂耳始终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原则，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是第一个倾注全部创作心血、用全部创作绝大部分篇幅致力于最底层人民劳动和生活题材的作曲家。

投入“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纵观聂耳一生的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从未消退且愈加顽强。大革命失败后，聂耳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就读，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

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聂耳并未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争意志，1928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印制张贴传单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1932年6月28日，聂耳在上海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是聂耳对其母亲提出的婚姻问题、回滇问题、人生问题做出的回答。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定斗争意志，积极主动担当。

“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国的侵略罪行，看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聂耳大胆发问，“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颓废的、色彩的靡靡之音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聂耳还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歌舞而歌舞”的口号，揭露以此掩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的本质。革命艺术化，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斗争，艺术革命化，让艺术充满革命的力量，革命

事业催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这是聂耳斗争艺术的最大特点。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养的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有的深重灾难，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聂耳正是在这种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他刻苦学习、敬业工作、严以律己，一天至少练习七个小时的琴，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创作、参加革命活动，还自学英语、日语、俄语。在为《新女性》配音时，三天三夜不睡觉，经常忙到废寝忘食。聂耳还积极主动学习革命理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养的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摘录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篇章。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他曾去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一起拉铁轡，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曾多次于凌晨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聂耳总是主动投身于各种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形势越是严峻、情况越是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就是为何聂耳的作品至今依然历久弥新、传唱不衰，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欢迎的原因。

